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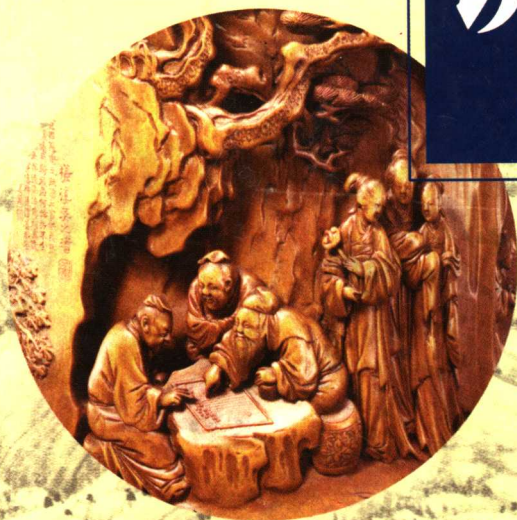
四書
通說

论语通说

①

邓球柏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DQB
5
B2

四书通说

邓球柏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论语通说



赠阅

R132.43/03

序

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将他生前回答学生和时人提出的问题以及弟子相互讨论问题的言论编辑成书，称为“论语”。《论语》由于传承的不同，又有《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的差别。《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肖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另外两篇（《问王》《知道》）则《鲁论》所无。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论语》，也没有《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两篇，但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故有两《子张》，共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论语》《鲁论语》同。按照传统的说法，今天流传下来的《论语》是《鲁论语》。据初步考证，流传至今的《论语》应是《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的合编本。首先，由张禹将《鲁论语》与《齐论语》合编为一，删其烦惑，除去了《问王》《知道》二篇，按照

《鲁论语》二十篇的次序写成定本，成《张侯论》。汉末，郑玄又以《古论语》为本，参考《张侯论》（陆氏则谓“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而为之注，完成了三部《论语》合编的工作。至魏何晏集诸家之说为《论语集解》，则三部《论语》进一步融合。故不能简单地说明本《论语》为《鲁论语》。

从《论语》的传授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汉魏对《论语》重视的程度。隋朝开始创建科举制，是否用《论语》做教材，尚待考证。但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论语》就被列为各科的必读书之一，而且有了口问对策。到了宋朝便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对《论语》研究时间最长、认识最透彻的要算程、朱。朱熹作《论语》的注释工作，长达四十余年。据江永《考订朱子世家》所记：孝宗隆兴元年，有《论语要义》，又有《论语训蒙口义》，隆兴八年，编次《论孟精义》，淳熙四年夏，《论孟集注或问》成，其后《集注》删改，日益精密。由于朱熹对《论语》进行了长期的认真的研究，因而他对《论语》的认识了解也最为深刻。因而他总结了一套学习研究《论语》的好方法。他在《论语序说》中云：“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程子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程子曰：‘顾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又在其《读论语孟子法》中说：

“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

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程子曰：‘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程子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程子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程子曰：‘《论》、《孟》只剩读着，便自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或问：‘且将《论》、《孟》紧要处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终是不浹洽耳。’程子曰：‘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程子曰：‘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程子曰：‘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这就要求人们亲身去体验古代圣贤的教导，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体验自己的生活，促进自己的身心修养。《朱子语类》卷第十九《〈语〉〈孟〉纲领》则有下列两段记载：

“孔门教人甚宽，今日理会些子，明日又理会些子，久则自贯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又耕些子，久则自周匝。虽有不到处，亦不出这理。”

“人之为学，也是难。若不从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处；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心上著切体认，则又无所益。且如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门许多弟子，圣人竟不曾以仁许之？虽以颜子之贤，而尚不违于三月之后，圣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于日用体验，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说‘非礼勿视、听、言、动’，盍亦每事省察何者为非礼，而吾又何以能勿视、勿听？若每日如此读书，庶几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为徒言也。”

“王子充问学。曰：‘圣人教人，只是个《论语》。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论语》须是玩味。今人读书伤快，须是熟方得。’曰：‘《论语》莫也须拣个紧要底看否？’曰：‘不可。须从头看，无精无粗，无浅无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读书未见得切，须见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论语》，第一便教人学，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谓甚切。’”

古人这些关于《论语》的导读意见，今天对于我们阅读《论语》依然具有参考意义。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研究《论语》，我们可以发现，《论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既会做人又会干事的内圣外王那样的大政治家。围绕这一目标，《论语》确定了如下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1. 立己立人的原则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对仁的一种界说。我们将其归纳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品德认识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人们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孔子看来，圣人和仁人是有区别的。子贡则将圣人与仁人混为一谈了。所以子贡问孔子：“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实惠，又能帮助广大人民提高生活水平，这样的人怎样？可以说他是仁人了吗？”孔子却说：“哪里仅仅是仁人呢！那一定是圣人了！尧、舜恐怕也难以做到哩！仁人是个什么概念？仁人想要自己立于天地之中，也希望别人能立于天地之中；自己想要通达幸福，也希望别人通达幸福。能够将心比心，就可以说是实践仁道的方法了。”孔子认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标准不能定得太高，太高了达不到。博施必须要有博

施的物质条件，济众必须要有济众的经济基础。博施济众不是人人都能够实践的。即使像尧舜那样的人也难以做到。所以孔子认为博施济众不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标准。标准只能定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求人们不要有嫉恨之心，要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

立己立人的原则一方面要求人们热忱地爱自己，爱他人，立自己，立他人，达自己，达他人；另一方面则要求人们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施加于别人，这也就是宽恕之道。

在《颜渊》中，仲弓问仁，孔子答之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解释这段话说：“推己及物，其施不穷，故可以终身行之，尹氏曰：‘学贵于知要。子贡之问，可谓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极之，虽然人之无我，不出乎此。终身行之，不亦宜乎？’”宽恕是立己立人原则的一个重要要求，它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样重要。宽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能恕与能忠是连在一起的。《里仁》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有人把“忠”解释成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要做到宽恕是不容易的。《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就是说，凡是我希望别人对我的态度，我绝不将这我反对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孔子认为子贡做不到。但这种反躬自省、将心比心的忠恕美德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戴东原说：“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我能受之乎？”墨子说：“爱人者

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扬雄说：“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立己立人原则就是爱己爱人的原则。

2. 修己安人的原则

《论语》中修己安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解决的是“自我与群体”“个人与他人”等关系。

《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就是孔子的修己安人原则。朱熹解释说：“‘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而子路少之……盖圣人之心无穷，世虽极治，然岂能必知四海之内果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尧、舜犹以安百姓为病，若曰‘吾治已足’，则非所以为圣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聪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飨帝。”

修己的内容是恭敬，“恭则不侮”，但恭敬必须有一定的节制，没有礼仪去规范，“恭而无礼则劳”。“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都是修己以安人，以安百姓的具体表现。《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

在《子路篇》中，“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这就是“修己安人”的具体作法。“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先有司”就是给工作人员做榜样。

思想政治教育的修己安人原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以身作

则，用自己的榜样去带动受教育者。在《子路》中记载孔子的两段话分别从正反两面强调了以身作则修己安人的重要性。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前一段话是这样理解的：如果领导人自己本身行为端正，即使不发出命令、号召，他所管理领导的地方的工作也会做得很好；如果领导人自己行为越轨，纵使他三令五申，别人也不听他的。可见修己的重要性，不修己怎么能够修人呢？只有修己才能修人。第二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端正了自己的行为，那治理国家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连自己的行为都越轨，那怎么叫人不越轨呢？所以必须坚持修己安人的原则。孔子反复申述了这一原则。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告诉季康子：政治就是正己正人。统治者自己能够带头做到端正，那还有谁敢不端正呢？因此修己安人的原则实际上就是正己正人的原则。只有正己才能正人。社会就是由个体和群体组成的。大家都正了，社会就能安定团结、稳定向前。

关于修己安人的思想原则，孔子在回答季康子的问题时作了三种规定和要求。《为政》：“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意思是“季康子向孔子请教说：‘要使人民严肃认真，忠心效力和互相勉励，应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你对待人民的事情严肃认真，人民对待你的行政命令也就会严肃认真了；你孝顺父母，慈爱幼儿，他们也就对你忠心效力；你提拔好人做官，教育能力差的人，他们也就努力劝勉了。’”对于修己安人的原则，曾子临死前也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泰伯》记载：“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

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鲁国大夫仲子孙捷（孟叔子）知道曾子满腹经纶，所以在临死时还向他请教。曾子讲出了修己安人的三条具体措施：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曾子的这三项要求不如孔子上面三项具体要求深刻。孔子是修己安人、修己修人，曾子是修己治人、修己威人。境界上是有差别的。

3. 亲亲忠君的原则

亲亲忠君的原则是《论语》思想政治教育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受教育者亲亲忠君。亲亲是对家庭成员的原则，忠君是对上级领导的原则。在家能亲亲，做官便能忠于上级领导，忠于职守，忠于事业。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亲亲原则的要求，不好犯上是忠君的表现。很好地赡养父母就叫做孝，很好地对待兄长就叫做悌。其能孝悌的人，都是心地善良和气柔顺的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忠诚于上级，忠诚于事业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抓人的品德的根本，根本就是亲亲，亲亲便能忠君，亲亲便能爱民，亲亲便能尊贤，亲亲便能敬事。所以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待妻子，重视其品德，而不注重其姿色容颜；侍奉父母，能尽心尽力；服事君上，能舍生拼命效劳；同朋友相交往，说话诚实守信誉。这样的人虽然没有学习过，但我一定说他学习过了。

理学家们认为子夏的话是说得好，但太绝对，有废学的偏向。所以说不如孔子说得好，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亲亲的原则发展下去就

是爱众、亲仁了。因此《论语》特别强调亲亲原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因而要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在《论语》中，亲亲是忠君的基础。当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的时候，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子的亲亲关系扩大到政治生活领域就成了忠君的君臣关系。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上下级关系，或者说是干群关系。忠，不仅是对上下级关系要忠，而且也是对于纵向的人际关系的要求。在《子路》中，记载了樊迟问仁的事。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就是说：平时容貌态度端正庄严，工作严肃认真负责，对别人忠心耿耿。这几种品德，即使到了外国，也是必须要坚持的。

4. 里仁尊贤的原则

里仁尊贤的原则是《论语》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条原则。里仁就是居仁，尊贤就是尊重人才。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无恶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郑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于仁者之里，是为美也。”皇侃曰：“里者邻里也。仁者仁义也。此篇明凡人之性易为染著，遇到善则升，逢恶则坠，故居处宜慎，必择仁者之里也……里者民之所居处也。周家去王城百里谓之远郊，远郊内有六乡，六乡中五家为比，五比为间，五间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百里外至两百里谓之六遂，遂中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鄆，五鄆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内，并同六遂之制也。仁者博施济众也。言人居宅必择有仁者

之里，所以为美也。里人既为美，则闾仁亦美，可知也。”（怀德堂《论语义疏》第二卷第23页）以上都说明了里仁的重要性。“里仁为美”是说人们居于仁道就是美德，有了这种里仁的品德就能给人们增加智慧。反之，不选择仁道居住，哪里会给自己增加智慧，使自己聪明起来呢？所以说“择不处仁焉得知”。不居于仁道的人是不可能长久居于穷困境地的，也不可能长久居于安乐之中。有仁德的人安仁道，实行仁道仁德他便心安理得，不实行仁道仁德他心中便不安宁。聪明的人利用仁道仁德会给他带来无穷的利益的，因而他便实行仁道仁德。因此立定志向实行仁道仁德仁行，绝对不会有坏处。

孔子肯定人们都有发大财、做大官的愿望，但是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官位、钱财，这是君子所不能接受的。同时孔子也承认人人都不希望贫困和下贱，如果有了贫困和贱位，那么君子也只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去克服贫困，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脱贫致富。孔子认为君子不能抛弃仁德，抛弃仁德仁道怎么会有好名声呢？君子应该时时刻刻坚持仁道居于仁德。但是爱好仁德仁道的人并不是太多。孔子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不曾看到过爱好仁德的人和厌恶不仁德的人。爱好仁德的人，那没有再比他好的了。厌恶不仁德的人，他就在施行仁德了，不让不仁德的东西施于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仁了。有谁能够在一天将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在仁上呢？我没有看见有力量不够的人。大概这样的人还是有的，只是我没有看见而已。”

居于仁道还应该向贤人学习，亲近贤人。所以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品德好的人就要向他看齐，向他学习，甚至选择对象也要“贤贤”。可见《论语》对里仁尊贤的

原则强调得很严格。又如：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强调事贤、敬贤的重要性。

5. 杀身成仁的原则

为仁德仁道而献身，是孔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项重要原则。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朱熹解释说：“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则成德之人也。理当死，而求生，则于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当死而死，则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实理得之于心自别。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也。古人有捐躯陨命者，若不实见得，恶能为此？须是实见得生不重于义、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杀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曾子将孔子这一原则引申发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思是：“读书人不可以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路途遥远。把实现仁道于天下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是担子重吗？到死才停止，不是路途遥远吗？”在《泰伯》中曾子还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意思是：“可以把幼小的孤儿和国家的命脉命运都交给他，在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能够不动摇不屈服——这种人是君子吗？是君子人哩。”在《子罕》中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安国曰：“三军虽众，人心非一，则其将帅可夺之而取。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皇侃说：“此明人能守志，虽独夫亦不可夺。若其心不坚，虽众必倾。故三军可夺，匹夫无回也。”

运用杀身成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唤醒祖国人民变法自强的典型要数浏阳烈士谭嗣同先生。

九十七年前，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戊戌）年八

月十三日。那天上午，北京城上空乌云密布，天色昏暗。加之途道相传慈禧太后已从颐和园回宫，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维新变法者纷纷被捕或四处出逃，一时间人心惶惶，预感大祸即将降临。果然到了下午，宣武门南菜市口，推来六辆囚车，一字排开，监刑官军机大臣刚毅一声令下，刽子手举起屠刀，寒光四射，砍下了六颗黄金无价的仁人之头：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弟、康光仁……戊戌百日维新的烈士们谱写了杀身成仁的悲壮历史。在这些烈士之中，谭嗣同先生可以说是自觉自愿用自己的鲜血、用自己杀身成仁的典范来教育祖国人民的先圣大杰。在那生与死、去与留的关键时刻，嗣同先生本来可以选择生、选择去，但他却选择了死、选择了留。先生于9月23日被捕，五天后就义。先生何以要选择留、选择死呢？先生的挚友梁启超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叙：“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廉之谕，君从容话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

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52页至53页。）

杨怀中先生对于嗣同先生杀身成仁之精神体会最深，阐释透彻。怀中先生说：“吾观世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家有大难，死一男而生一家，孝子所愿也。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男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夫人谁不爱其生，然而甘心死者何？生不忍不死也。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成仁而死，则身死而心生；害仁而生，则身生而心死。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人之心非他，即天地之心也，非徒以私利其身而已。彼仁人者以心为天地之主宰，而身为心之庐舍，则其以一身为腕固宜。夫仁人之甘死以成仁，庸众之所以不喻也，非达性道之源者，曷足以语于斯！”（《达化斋日记》）怀中先生可以说是嗣同先生的弟子。据长沙曹典球作《杨昌济先生传》记载：“盖一八九八年，湖南戊戌维新运动，开南学会，先生方居岳麓书院肄业，独离开山长王先谦，入会听讲发问，谭嗣同答之曰：‘于圣贤微言大义晦盲百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第383页至384页。）毛主席深受怀中先生的教诲，吟咏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不朽诗句，一家六位革命烈士则谱写出了杀身成仁的悲壮诗篇。革命烈士夏明翰1928年2月8日在汉口被国民党逮捕，次

日英勇就义。临刑前写下了壮烈的杀身成仁诗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革命烈士刘伯坚先生在狱中写下的《带镣行》告诫人们要为真理而献身。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杀身成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生命鲜血谱写的一曲曲悲壮的杀身成仁的圣歌为我们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

6. 三戒三畏的原则

所谓三戒的原则是：“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朱熹阐述道：“血气，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得，贪得也。随时知戒，以理胜之，则不为血气所使也。范氏曰：‘圣人同于人者血气也，异于人者志气也。血气有时而衰，志气则无时而衰也。少未定、壮而刚、老而衰者，血气也。戒于色、戒于斗、戒于得者，志气也。君子养其志气，故不为血气所动，是以年弥高而德弥劬也。’”

所谓三畏的原则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诚当然也。小人不务修身诚己，则何畏之有？”三戒三畏原则，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盲目性。前三戒是根据人年龄段来划分所遵循的原则的要求，后三畏则是因为不了解自我，也不了解自然所作出的盲目崇拜的要求。

7. 损益忧乐的原则

损益忧乐的原则要求人们坚持发扬有意义的行为以便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去掉不良的有害的没有意义的行为以便给自己免除忧患烦恼。在《论语·季氏》篇中有两段话体现了这一原则。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即告诫人们：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应该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诚实的人交朋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这样你就会幸福、快乐。与阿谀奉承的人交朋友，与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的人交朋友，与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就一定会吃亏上当，给自己带来痛苦和忧患。因此不能与这样的人交朋友。

但是人的快乐也有优劣的区别。所以孔子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也有三种。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快乐，以宣扬别人的好处为快乐，以交结许多有益的朋友为快乐，这就会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快乐。如果以骄傲自满为快乐，以游荡玩耍为快乐，以饮食荒淫无道为快乐，就会给自己带来灾害。这应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境界有所区别。

8. 安贫乐道的原则

安贫乐道的原则要求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被贫困吓倒而继续像处在富贵幸福的时候一样仍孜孜求索不改其乐。这是一种幸福快乐的精神境界，一种极乐境界，但不是要求人们追求贫穷。因为贫穷是人之所恶也，只是在处于贫困的时候还应志于乐道。《学而》记载孔子回答子贡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贫穷而不去讨好巴结别人，富贵而不骄傲，这本来是不错的了。但孔子认为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可见孔子追求的是“安贫乐道”的原则、境界。所以孔子非常欣赏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非常有修养，精神境界高。一竹筐饭，一瓜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样穷苦生活的忧愁，颜